

构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分析模式——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中国集市体系理论

□ 安依林 彭 勇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是美国人类学界的杰出学者，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汉学家，先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科研机构任职，他著作等身，研究兴趣广泛，一生致力于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历史经济区域等研究。基于多学科的知识背景，通过实地考察和长期的研究，施坚雅构建了一套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分析模式，这套理论体系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影响着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认知。

（一）

施坚雅在1947年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要研究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1949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写作，施坚雅选取了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调研期间，施坚雅与当地普通百姓同吃同住同生活，建立了较好的人际关系，为施坚雅获取扎实的调查资料提供了基础。

施坚雅田野调查的内容细致而丰富。正如他所言，他想尽可能多地记录下农家的日常生活。施坚雅调查的内容

包括人口、日常劳作生活、城镇集市的区域、娱乐活动、教育等。他的大部分访谈是在集镇中的茶馆进行的，有时也做问卷调查或直接家访。通过和乡绅以及各类人群的交流，施坚雅逐渐对四川基层市场体系的运作有了自己的认识。

施坚雅的调研活动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来中国后，施坚雅的学术组织挂靠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当时，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大师云集，他们均重视“集市”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作为施坚雅的中国导师之一，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史专家蒋旨昂对其考察的地点、方法、访谈的对象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具体的指导；华西大学教授梁仲华则提醒他注意市场体系与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田野调查期间，他始终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定期与师生交流讨论。在华西大学师生潜移默化影响下，施坚雅改变了之前对乡村进行田野调查的计划，转而关注当地的市镇区域，并逐渐形成对中国市场体系的认识。

这些在中国的大量田野考察，为施坚雅学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施坚雅的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中国集市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前者主要是他通过在四川的田野考察分析得出的，用以分析中国的乡村社会；后者是在对农村市场体系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翻阅浩如烟海的文献提出来的，用以分析中国城市化问题。

（二）

传统汉学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传统的汉学家多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与西方文明异质的、停滞的古典文明，如以“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过于强调西方列强等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作为继费正清之后美国第二代汉学的领军人物，施坚雅主张转换视角，从中国内部来理解中国自身的发展演进脉络，推动传统汉学研究向中国学研究的转向。施坚雅的中国学研究，事实上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且包罗万象的研究模式。整体而言，施坚雅模式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重视中国区域史的研究。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是在对成都平原的农村地区进行充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此基础上，他将这一理论体系延升到整个中国，提出宏观区域理论。施坚雅反对将中国视为均质同一的实体，注意考察中国内部焕发的活力与持续性的变动。他对区域发展周期的考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王朝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以综合性、长时段视角来考察中国这一庞大系统内部的复杂变迁。

其二，坚持以中国内在特征为标准探讨中国社会。与以行政层级为中国区域划分的标准不同，施坚雅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分析，特别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他以市场网络为标准，重新划分中国区域，提出了五级中心地和九大宏观区域。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市场网络层级与传统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市场与行政力量平行共存，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后者的力量，也是后者的重要补充。在行政力量渗透较为薄弱的边缘地带，市场很好地填补了行政权力的不足，成为维系、统合乡村的重要力量，他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正是为了解释基层市场对属地民众的影响与控制力。施坚雅从市场和行政这两个视角来定位中国城市，强有力地冲击着以西方城市标准定义中国的韦伯模式。

其三，使用多学科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坚持田野考察与文献实证相

结合。施坚雅对农村集市的最初印象来自在四川的考察，他的研究特别注重各种文献资料。《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的资料，包括数千部方志、旧报纸杂志、政府公报、年鉴、统计报告等。其次，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在探讨中国社会的市场体系时，使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宏观区域的划分，运用了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对各宏观区域发展周期的探讨，借鉴了政治学的发展周期论；对宏观区域中“中心—边缘”理论的研究，运用了生态学的肥力迁移说。计量分析也是施坚雅常用的手段，通过数据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基层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的关系；通过对各区域人口密度的计算，推论出各区域现代化的程度；他还使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对当代中国各地区进行分析，开发中国空间结构模型。

（三）

除了在汉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贡献之外，多年来，施坚雅还坚持通过赴华参加学术研讨会、接受中国学者专访、捐赠图书等方式，积极推动中美两国学术交流。

1980年，“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施坚雅作为美方代表团副团长提交了参会论文“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市场体系与区域经济：结构与发展》）”，将施坚雅模式直接介绍给中国同行。

1999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对施坚雅作过专访。施坚雅用了一个多小时，第一次就其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早期学术经历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此次专访经整理后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年，当时已80岁高龄的施坚雅再次访问中国，作了多场学术报告，介绍其相关研究成果。在上海市举办的东方论坛“走进大师系列”中，施坚雅作为首场报告的主讲人，作了题为《当代中国不平衡发展的地域因素》的报告，为上海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随着学界介绍和讨论的深入，施坚雅模式的经验和方法越来越为中国学者所熟知。一些学者走出书斋，走出传统的研究范畴，利用田野考察和多学科的知识重新审视相关研究领域。可以说，施坚雅模式促进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和转型。

施坚雅学识广博，藏书丰富，临终前他决定将所藏英文书刊捐赠给中国。施坚雅通过好友包弼德联系到了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表达了将他的英文书籍和刊物赠予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愿望。这些书刊的数量非常庞大，共计4000多册，涉及18个类别，价值也非常高。在复旦大学和葛兆光教授的大力协调下，图书被分两批运抵国内。葛兆光教授最初希望建设“施坚雅文库”以珍藏这批书刊。对此，施坚雅的遗孀苏珊教授表示，施坚雅之所以将这批书刊赠予复旦，就是希望它们能像其他书刊一样，被复旦师生广泛地阅读利用，而不是作为纪念品陈列起来，这才是对施坚雅最好的纪念。后来，这些赠书被复旦大学图书馆编码完毕后全部对外开放，和普通书刊一样能被复旦师生和其他学者广泛地查阅。



□ 孙中华

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张元济（1867—1959年），字筱蓑，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爱国实业家。先后任清廷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维新运动时，在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戊戌变法失败后，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1903年正式入职商务印书馆，曾任经理、监理、董事长，参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和教育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一）

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初创时，以承印名片、广告、簿记等为主。这时它还只是一家印刷作坊，其蜕变和繁荣是张元济进馆开始的。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1903年，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总经理夏瑞芳正式邀请张元济入职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两人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二）

晚清以降，近代中国频遭列强入侵，民族存亡之际，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整理国故运动逐渐兴起。张元济也加入这一潮流之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依托，他主持整理出版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致力于古籍的保存、整理和流传。

20世纪初叶，张元济因感慨“求书之难，国学之微”，于是着手整理出版古籍，名曰《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的整理，既注重系统性，也注重版本，以“书贵初刻”为原则，大力搜求古籍。张元济不仅亲赴日本寻访古籍，还亲自撰写校勘记42篇、跋文109篇。从1919年至1923年，《四部丛刊》共出版323种8548卷2100册。1934年、1936年又相继出版“续编”“三编”，共计145种1000册。

官修“二十四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文献。有感于清末时流行的乾隆朝官刻武英殿本脱漏错讹之处颇多，张元济开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为此，他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一是广搜善本，校勘整理时，底本、校本均为善本；二是成立校史处，进行校勘、描润等；三是制定《修润古书程》《制版须知》《修润要则》等规定，并亲自监督整理出版工作。因采用不同版本互校补配而成，好似僧人的百衲衣，故名《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出版，至1937年共计820册3301卷。

此外，为方便编译图书，也为保存善本古籍，张元济主张建立在当时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美誉的东方图书馆。1904年，图书馆初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1926年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并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共7万余册，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和孤本3.5万余册，包括存世极少的《永乐大典》25册。另有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家批校本288种。后来，东方图书馆不断增加藏书种类，藏书达到46万余册，规模为当时亚洲之最。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淞沪，东方图书馆被炸焚毁。张元济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痛心之余，他编著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希望借此书告诉国人，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

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二）

晚清以降，近代中国频遭列强入侵，民族存亡之际，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整理国故运动逐渐兴起。张元济也加入这一潮流之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依托，他主持整理出版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致力于古籍的保存、整理和流传。

20世纪初叶，张元济因感慨“求书之难，国学之微”，于是着手整理出版古籍，名曰《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的整理，既注重系统性，也注重版本，以“书贵初刻”为原则，大力搜求古籍。张元济不仅亲赴日本寻访古籍，还亲自撰写校勘记42篇、跋文109篇。从1919年至1923年，《四部丛刊》共出版323种8548卷2100册。1934年、1936年又相继出版“续编”“三编”，共计145种1000册。

官修“二十四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文献。有感于清末时流行的乾隆朝官刻武英殿本脱漏错讹之处颇多，张元济开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为此，他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一是广搜善本，校勘整理时，底本、校本均为善本；二是成立校史处，进行校勘、描润等；三是制定《修润古书程》《制版须知》《修润要则》等规定，并亲自监督整理出版工作。因采用不同版本互校补配而成，好似僧人的百衲衣，故名《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出版，至1937年共计820册3301卷。

此外，为方便编译图书，也为保存善本古籍，张元济主张建立在当时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美誉的东方图书馆。1904年，图书馆初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1926年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并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共7万余册，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和孤本3.5万余册，包括存世极少的《永乐大典》25册。另有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家批校本288种。后来，东方图书馆不断增加藏书种类，藏书达到46万余册，规模为当时亚洲之最。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淞沪，东方图书馆被炸焚毁。张元济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痛心之余，他编著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希望借此书告诉国人，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

格，民族精神就在，国家就不会亡。这也展示了他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出版救国、传承中华文脉的决心。

（三）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张元济积极完善财务、版权、人事制度等，建立较为完备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实现自己“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的宏愿。

1920年，张元济邀请刚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成回国的杨端六入馆，任会计主任，对会计制度进行改革，使原先混乱的财务工作走上正轨。自此，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代最早采用新式簿记法记账的出版企业之一。1903年，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与严复就译书《社会通论》签订了我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合同。1905年，张元济还积极参与到版权立法工作中，为清政府商部所拟的版权律、出版条例草案撰写了修改意见书。

在选聘员工时，张元济要求采取严格的回避制度。他在日记中写道：“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因此，他反对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的女儿到公司任职。他认为，商务印书馆子弟应该“在外办事，多受磨练”，待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后，再由公司聘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2年，他的儿子张树年取得纽约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谈及就业问题时，表示不愿进政界和洋商企业工作。他支持儿子的决定，但接着说道：“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以身作则，使商务印书馆在人事制度上符合现代企业的需要。

1949年9月，因为在中国文化出版界的重要影响力，82岁高龄的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曾任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在上海逝世。著名作家茅盾这样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



“忠恕”一词出于《论语·里仁》。《论语·里仁》记载，孔子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参只说：“唯”，并没有正面回答或阐释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在何处。当孔子走后，门人问起曾参时，曾参才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一段文字字数不多，但非常生动，令当时场景如在读者眼前，栩栩如生，彰显了孔子与曾参之间心意相通、心领神会、以心传心、以心印心、默契无间的师生之情。从此，“吾道一以贯之”与“忠恕”成为千百年来儒学探讨的重要主题。

“忠”“恕”两字字形比较简单。“忠”字上“中”下“心”，本义为中心——内心符合中道。《中庸》第一章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可见，“忠”字所代表的精神世界至善至美，其境界尽精微而极高明，只有圣人才能达到，“从容中道，圣人也”。因此，“忠”字寓意内心中正、至公、无私，为诸德之基，构成了忠信、忠诚、精忠报国、忠贞不二等对个人道德要求极高的词汇。“恕”字上“如”下

“心”，本义为如己之心，或者说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替别人考虑，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仁爱精神，因此《说文解字》曰：“恕，仁也。从心，如声。”《孟子·尽心上》认为恕是实现仁的最好方法，“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正是有了恕的方法，才能发展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朱熹在注释《中庸》时指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忠”要求内心符合中道，意味着个体生命

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要有一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全面彻底的认识和评价；“恕”要求在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内心世界的基础上，推己及人，宽恕别人的过失和缺点。可见，从“忠”到“恕”，是一个不断消解偏见、偏执、狭隘、短视、仇恨、贪欲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升精神境界的过程，所以，“忠恕”是一种个体与自己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和解。结合孔子的人生遭遇，可以想象，“忠恕”是生命历经艰难、磨难、苦难、劫难之

后的豁达与深悟，充满了对每个生命乃至这个世界的珍惜、原谅、宽恕与深爱，内蕴深沉厚重的仁爱精神。在《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再次强调了“恕”在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上所述，“忠恕”是内心世界深沉平静后所生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它贯通心身、内外，以温、良、恭、俭、让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奉行

“忠恕”精神的个体在处理人我、群己、家国、天人、公私诸关系时，能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而理性地看待处理与自己内心世界，以及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孔子认为，人们秉持“忠恕”是可以相互尊重、互谅互让的。《论语·公冶长》有云“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意思是“伯夷、叔齐这两兄弟不记旧仇，因此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很少”。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不仅引用了这句

话，还接着引用孔子的“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以表达对伯夷、叔齐“忠恕”精神的认同。

虽然“忠恕”是个体生命与自己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和解，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和解是无原则的和解，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明确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面对非正义之人之事，有德之人不是一味妥协，而是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惠来回报恩惠。

总的来说，“忠恕”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境界，极少有人可以达到。尽管如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忠恕”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坚持忠于内心、时常自省，同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就会离“忠恕”境界越来越近。

